

试论农村人口流动的 生育效应

徐天琪 叶振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迅速地发展,中国经济逐渐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加剧,迅速汇集成一股汹涌的浪潮。同时,这一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也给他们自身的生育行为带来了重大影响。现实需要理论及实际部门探究这一崭新的课题。本文主要探讨农村人口流动的生育效应。所论及的农村人口流动,是指不变户籍,越过乡、镇边界流出3个月以上的人口流动现象。

农村人口流动的生育效应比较复杂,因为人口流动的动因各不相同,它对生育的影响也就各异。按性质划分,人口流动可分为经济性流动、社会文化性流动、政治性流动和其它流动等方面,因此也可以相应分为经济活动型、功能型等不同类别。

经济型流动是指为谋取某种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人口流动。其具体形式有劳务输出(包括在外地企业从事第一二三产业)、购销活动(包括参与驻外经济机构办事的人员等)、在外地开办企业和从事经营事业,以及协助外商来华从事经济活动等。

社会文化性流动是指为达到一定的社会或文化教育方面的目的而进行的人口流动。包括婚配、就学、就医、旅游、演出和投亲靠友等。

政治性流动是指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流动。包括赴会、参观、检查工作、军事行动等。

其它流动包括为逃避计划生育或从事其它目的的盲目流动和非法分子的流窜等。

对生育影响关系最密切的是经济性流动以及社会、文化性流动中的婚配流动和其它流动中的“逃

生”、“盲目流动”。这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流动人口的生育效应按作用的区域大小可分为局部效应和全局效应。按发生作用的时间又可分为近期效应和远期效应。下面着重从近期效应和远期效应的角度加以探究。

二

农村人口流动的近期生育效应,是指农村人口流动对生育状况的近期直接影响。在农村,人口流动与计划生育在近期会产生较大的矛盾,它刺激生育率的不断上升。之所以出现这种推动效应,原因如下:

(一)宏观的国家整体利益与微观的家庭局部利益的矛盾。从宏观上讲,中国农村目前人口再生产的现状是人口数量多,基数相当大,并且正面临新的生育高潮。因此,必须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以减轻对社会、经济的压力。但从微观上讲,目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比较低,生产力要素中劳动力的数量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中,对劳动力数量的追求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事实证明,目前农村迅速富裕起来的大多是劳动力充裕、可以组织分工协作、最后形成一个合力的大家庭。仅靠单丁、独女成为富户的终究还是少数。这样的事实诱发农民家庭多生孩子,特别刺激了要生男孩的强烈欲望。这一诱惑力对流动人口家庭作用显然更加明显。据我们对浙江6个县区经济活动型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在1989年1~6月份流动外出的这类人口中,男性数量为女性的2.5倍。由于男性劳动力缺乏,责任田无人种,体力型家务活没人干,这就促使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愿望比非流动人口家庭更强烈。我们通过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证实了这一点(见表1)。

计算表明,流动人口希望生育子女数平均为2.08个,而非流动人口则为2.01个,前者比后者高3.5%。对于生育男孩的欲望,流动人口家庭比非流动人口家庭高得更多。据对表1中5599人的对比调查,流动人口希望生育男孩数平均为1.01个,非流动人口为0.96个,前者比后者要高5.2%。这不能不说是微观的家庭利益所起的生育效应。

(二)新的商品经济意识与旧的传统婚、育观念的矛盾。流动人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商品经济意识在流动人口中影响日渐扩大。商品经

济突出人的社会价值，突出人对社会的贡献，而不赞成“人多”、“子孙满堂”；商品经济的竞争性要求以人口素质取胜，不靠人口数量竞争；商品经济的时间观念要求时间即生命，用效率来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商品经济的幸福观是以“竞争、创造、进取”来取代“老婆、孩子、热坑头”。这

些都强烈地催化着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与此同时，由于上层建筑转变的滞后状态，使得旧的传统婚育观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早生贵子早得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仍深深地影响着广大农村人口，顽强地抵抗着商品经济意识的冲击。这使得流动人口把在流动中增加的收入仍投放在生育上，把生儿育女看作是最佳的当然投资项目，甚至出现待价而生、“花钱买儿子”这种奇特的现象。据对浙江省6个区、县的抽查，超生的113个孩子中，60%为有流动人口的家庭所生，其中平原地区这一比重为45%，山区为58.3%，海岛为71.4%。

(三) 农民收入增长迅速与子女成本提高不快、效用下降缓慢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流动人口取得的经济效益则更大。在一般情况下，会出现养育子女成本相应迅速提高，而子女效用迅速下降。这就会抑制人们的生育愿望。但目前的情况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远远超过养育子女成本的增加，而子女效用仍然很高，这使得养育子女的边际效益价值居高不下，多育对于父母来讲还是极为有利的。

养育子女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家庭培育子女到成人，花费在子女饮食、穿着、居住、娱乐、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的费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直接成本”随着收入增加也会不断提高，并占很大比重。在中国，由于国家和集体长期予以巨额的补贴，家庭费用增加微乎其微，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仍然很低。“间接成本”是指父母为培养教育子女而丧失的精力、时间和就业机会等折合的费用。在中

表1

农村家庭生育意愿比较

(人)

地区	生育意愿	流动人口				非流动人口			
		一孩	二孩	三孩	三孩以上	一孩	二孩	三孩	三孩以上
萧山市农村		21	252	13	1	8	87	3	0
义乌市农村		28	379	23	11	47	646	45	20
海盐县农村		108	422	1	1	75	1024	6	0
新昌县农村		26	80	1	0	54	210	9	4
缙云县农村		4	183	39	110	7	158	59	57
普陀区农村		85	669	30	20	112	446	15	2
合 计		272	1985	107	143	303	2571	135	83

国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这种因培养教育子女而丧失的精力、时间和就业机会的价值并不高，“间接成本”很低。而另一方面，子女效用仍很高，这里所指的效用包括经济效用和精神效用。从经济效用来讲，尽管目前农村家庭的子女已不会象过去那样把他们创造的财富全集中到父母手中，但是子女对父母老年生活的保障作用却依然巨大，并更显突出。这是因为供养子女时间短，而反馈供养时间长，后者几乎是前者的3倍以上，又加上供养子女内容在农村较简单，而反馈供养甚广泛。对于流动人口家庭，由于深感家庭中劳动力缺少的不便和损失，子女的经济效用会大于非流动人口家庭。从精神效用方面讲，子女给家庭带来欢乐、美满和幸福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大。所以，许多调查资料中，“养儿防老”和“调剂夫妻感情”是目前农村人口生育子女的最主要动因，表明子女效用极大。较低的养育子女成本和较高的子女效用，导致子女边际效益也较高，使农民，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感到生儿育女还是非常合算的。于是经济收入的增加在近期内不但没有抑制住流动人口的生育欲望，反而导致了生育率的上升。

(四) 计划生育先进地区和后进地区工作差异的矛盾。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人口流动数量极少，在这种近似封闭的状态下，计划生育先进地区和后进地区的工作差异互相影响不大，随着农村改革深入，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封闭状态被打破了，计划生育工作差异的信息互相传递，冲击着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

从计划生育后进地区进入先进地区的流动人口，把后进地区的信息传递进去，造成了先进地区

计划生育工作的混乱,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比如,从云南、贵州、四川边远地区进入浙江的大量女性人口,沿袭原籍早婚、早育、多育的陋习,与本省大龄男青年结合,成为浙江生育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这导致了当地男女青年的思想混乱,促成近几年浙江未婚同居、未婚孕育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地区间计划生育工作的差异,在人口流动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已成为计划外生育的“防空洞”。到浙江婚配落户的不少来自计划生育后进省区的妇女,为强行生育孩子又偷偷跑回原籍。浙江当地的一些妇女,去外地“逃生”的也不少。据报导,流动在甘肃省嘉峪关市的2300余名育龄妇女中,近1/3生育了二胎甚至多胎,这是地区间计划生育工作差异所起的不同生育效应。

(五)新形势、新情况与旧管理、老办法的矛盾。在广大农村,原来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单一经营,按工分统一分配。与此相适应,也有一整套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妇女队长领导妇女生产,也管计划生育,孕情能够较早发现,按工分统一分配,因而计划生育奖惩措施兑现困难不大,高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和集体经营,可以保证对育龄人群施行注入式、封闭式的思想教育。显然,旧体制的集体劳动生产条件下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和措施。

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农村实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日益活跃。这种新形势、新情况与旧的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和措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从管理方法上讲,计划生育的传统管理方法是单纯由户籍所在地负责管理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的特征是人户分离。这样对流动人口往往是本地管不着,外地不愿管,户籍所在地与流入地有关部门或单位相互推诿、扯皮,造成很大的漏洞。

在管理对象上,传统体制主要是针对已婚育龄妇女。但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未婚同居、未婚受孕并生育的数量也迅速递增。据我们对780名在浙江农村滞留的外省妇女抽查,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已同居的达到231名,占总数的36.4%,用老方法在新环境下来管理这批女性的生育是很困难的。

在计划生育宣传上,目前农村人口接受计划

生育信息的主要途径依然是会议宣传和干部下户动员。流动人口由于长期在外,不能参加当地会议,当地干部难以与其联系,几乎无法实行针对性教育。而接受计划生育信息及宣传的频率与生育率的高低有极密切关系。流动人口由于长期得不到这方面的信息,必然使计划生育观念淡薄,对人口政策不甚理解,或为计划生育的“死角”。

在传统的计划生育管理体制下,由于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与计划生育工作对象的空间距离很短,对其婚育情况容易了解,节育措施也易于落实。而流动人口近则离乡、出县,远则出省。在我们抽查的1988~1989年3993人次的3个月以上流动人口中,外出在乡以外、县以内的有1820人次,占45.6%;外出在县以外、省以内的有1599人次,占40.0%;出省的574人次,也占到14.4%。由于工作距离的延长,往往会使信息传递扭曲甚至中断,对婚育人群的孕情无法掌握,节育措施也无法落实。往往是外出时一对夫妇,几年后回来拖儿带女。这期间出生的人口不进入人口统计数字之内,成为“黑户口”、“黑人”。

在计划生育的奖惩上,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使过去行之有效的奖惩方法失去了效用。由于农村分配方式的变更,流动人口的收入一般已不再通过当地集体经济取得,罚款也成为空中楼阁。更因为流动人口收入较高,原定的少量奖励,所起的效用日益下降。

三

农村人口流动的远期效应,是指农村人口流动对生育状况的长远影响。如前所述,人口流动在近期内确实会刺激生育率的上升,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人口流动的远期生育效应。从长远的发展趋势看,农村人口流动对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有利的。

(一)流动人口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大潮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出现的,同时它又促进了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出现和发展,既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又解决了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专门劳动力短缺问题。事实也表明,流动人口规模与城乡经济发展一般呈正比关系。人口流动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同时加速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换。据1983年世界银行对128个地区和国家的统计,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为280美元)除去中国和印度,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9;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40美元)妇女总和生育率为4.8;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950美元)妇女总和生育率为4.0;东欧国家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3;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1430美元)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8。显然出生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强负相关关系。但也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水平是出生率下降的终极原因,其作用要通过许多中间变量,如教育程度、医疗水平、家庭方式、生育观等起作用。而这些中间变量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其作用在短时期内几乎难以觉察出来。在短时期内,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反而促使人口增加。但当经济发展超过某一界限时,这些中间变量的变化开始不断加快,最终导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很多国家调查资料表明,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50美元以上时,人口生育水平开始下降。

中国一些地方的调查同样表明,人均收入达到1400元时,生育率会下降。所以,人口流动引起的经济加速发展,可以缩短使中间变量达到加速变化的界限的时间,使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及早转变为“低低、低”类型。

(二)流动人口的发展加快了人们生育观的变化,这也会促进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经济发展对出生率的影响要通过许多中间变量的变化得以实现,而在诸多中间变量中,生育观对出生率的影响最大。生育观的变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决定的,流动人口所处的较为特别的物质生活条件会促使其生育观比非流动人口转变得更快。

流动人口的智力素质一般均高于当地农村人口的平均水平。我们对浙江省农村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进行对比调查,结果表明两者差距很大(见表2)。

表2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比较

文化程度 类 型	大 学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文盲半文盲	
	人数 (人)	所占比重 (%)	人数 (人)	所占比重 (%)	人数 (人)	所占比重 (%)	人数 (人)	所占比重 (%)	人数 (人)	所占比重 (%)
流 动 人 口	6	0.2	247	8.0	1138	36.7	930	30.0	778	25.1
非 流 动 人 口	4	0.1	178	4.6	1204	31.4	1093	28.4	1364	35.5

较低素质的人口在流动中很易失败而被迫返回原籍。所以他们比非流动人口更深刻感受到子女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在生育上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开始实行优生、优育、优教。

流动人口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大部分时间要用于获取信息,开展公关活动,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太多时间花费在生育儿女上,子女培养与生产经营利益上的矛盾会逐渐降低子女的效用。

另外,受收益差异的影响,人口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低收入地区至高收入地区,由农村至城镇。据对浙江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样本分析,流动人口中流向城镇的比重为62.6%,流向比本地发达和与本地差不多地区的比重达90.6%。这些流动人口受高收入地区和城镇人口生育观的影响,会较快的改变自己的生育观。抽查在浙江农村居留的670名外省、区妇女,她们大多来自生育率较高的西南省份,在浙江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受当地人口生育观

念影响,其生育观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见表3)。

表3 浙江省外来女性人口生育意愿

	不要孩子	要一个孩子	要二孩子	要三个及三个以上孩子
人数(人)	4	293	365	8
占总数比重(%)	0.6	43.7	54.5	1.2

外来妇女希望生育孩子数平均仅1.57个,远远低于原籍地女性人口的生育意愿,甚至低于当地妇女的生育意愿,这除了家庭关系不够稳固的因素作用外,不能不承认是当地生育观念强制力作用的结果。

(三)人口流动可以扩大通婚范围,提高人口素质,为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长期来,中国农村人口的通婚范围很窄,据有关部门对全国6个省市1.441户农

(下转第53页)

表11 1918年东北人口除去主要死因后
平均寿命增加量(岁)

年 龄	除去传染病		除去呼吸系病	
	中国人	日本人	中国人	日本人
0—	6.93	8.09	6.30	7.69
5—	6.94	7.50	5.32	6.03
10—	7.60	7.02	4.69	5.91
15—	7.14	5.37	4.34	4.53
20—	6.54	4.51	4.11	4.07
25—	5.35	3.77	3.83	3.51
30—	4.58	3.08	3.32	3.06
35—	3.74	1.54	3.01	1.69
40—	3.04	2.20	2.72	2.69
45—	2.21	2.01	2.43	2.46
50—	1.49	2.00	2.09	2.20
55—	0.83	1.72	1.70	2.13
60—	-0.21	1.55	1.31	1.94
65—	0.95	0.46	1.00	1.30
70+	0.65	0.26	0.70	1.34

资料来源: 同表6。

(本文责任编辑: 王跃生)

表12 1938年东北人口除去第
一位死因后平均寿命增
加量(岁)

年 龄	中国人	日本人
0—	6.38	11.51
5—	4.11	8.12
10—	3.50	7.35
15—	3.22	6.74
20—	2.91	5.09
25—	2.68	3.96
30—	2.43	3.03
35—	2.23	2.69
40—	2.02	2.28
45—	1.77	2.08
50—	1.49	1.64
55—	1.05	1.22
60—	0.70	0.76
65—	0.52	-0.48
70+	0.37	0.46

资料来源: 同表6。

(作者工作单位: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人口研究所)

下, 生存条件差, 更缺乏基本的卫生保健措施, 至使一些疾病发生率
高、死亡率
高。
参考文献:
1. 姜念东
等: 《伪满洲国
史》, 吉林人民
出版社, 1980。
2. 三浦运
一: 《东北各民
族之生死统
计》, 国立沈阳
医学院医学杂志
第1卷, 中华民国
36年12月1日发
行。

(上接第42页)

民家庭的调查, 中国大多数农民的通婚范围不超过25公里。有84.71%的农民通婚不出县; 51%的农民通婚不出乡; 30%的农民通婚不出村。这使得出生婴儿的死亡率较高, 为补偿婴儿死亡, 又必然会提高人口出生率。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 可以有效

地扩大通婚半径, 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 降低出生婴儿死亡率, 从而促使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本文责任编辑: 宋黎明)

(作者工作单位: 徐天琪 杭州大学人口研究所叶振东 绍兴市委党校)

(上接第12页)

or Socialist Strategy" in A.A. Brown and E. Neuberger (eds.), *Internal Mig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277-303.
Ofer, Gur, 1980.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and Socialist Growth Strategy: A Historical Analysis, 1940-1970" in Steven Rosefielde (ed.), *World Communism at the Crossroads: Military Ascendancy, Political Economy, and Human Welfare*,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ing, pp. 131-159.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rift, Nigel and Forbes, Dean, 1986. *The Price of War: Urbanization in Vietnam 1954-85*, London: Allen and Unwin.
Zaslavsky, Viocor and Luryi, Yuri, 1979. "The Passport System in the USSR and Changes in Soviet Society", *Soviet Union*, Vol., 6 Pt.2, pp.137-153.
同济大学等, 《城市规划原理198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马侠: "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国内人口迁移及今后展望", 《人口与经济》1987第2期, 3-9页。
陈胜利: "四十二年(1940-1981年)来妇女的生育状况"《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分析》1983, 30-51页。

(本文责任编辑: 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 香港大学地理地质系)